

特殊教育的爱

■袁丽明

常听同事们说,我们学校的前身是聋哑学校,学生是清一色的听障儿童,课堂是寂静无声的。后来不断发展,学校除听障学生以外,还招收多动症、孤独症、唐氏综合征、智力障碍等各类适龄残障儿童。校园由格外安静变得格外热闹。

学生的好奇心强,自控力差,破坏力大。能把水龙头弄断,能把窗户上笔直的钢筋条弄弯,能把厚厚的门板弄得东一个坑西一个洞的,能把鞋子塞进厕所的下水道里堵得恶臭横溢……对于正常孩子来说,这些行为要算恶作剧。可特殊儿童有很多举动是无意识的,他不知道不能做,也不觉得这样好玩,他们像研究外来生物一样对待生活中遇到的物事,眼眸里总闪烁着不轻易被常人看懂的神采。

每个家庭都希望孩子是健康健康的。从某个角度来说,每当我们学校多一名学生,背后就多了一个牵挂的家庭,甚至,对于有些家庭来说是一份沉重的负担。所以,我的同事们与其他学校的老师不太一样,不敢有“桃李满天下”的愿望,只惟愿天下孩子都是健康的,都能快快乐乐地进入普校学习生活。或许,对于普校的教师来说,看着自己培养的孩子

取得优异成绩、步入高等学府是最高兴的事;而对于特校来说,孩子们能够自食其力、能有尊严地立足于社会,就是非常美好的向往了。老教师们常告诉我们这些新来的年轻人:与这些孩子同行是积德行善,要凭良心,没有充足的爱心、耐心和责任心,是做不好这项工作的。爱与责任的火炬,在每一位教师手里传递,在每一位教师心里燃烧。

我们学校是寄宿制的,一个月放假一次。孩子在校期间的衣食住行、吃喝拉撒,全都由老师操心照顾。多数孩子天热了不知道减衣,天冷了不知道加衣,需要老师叮嘱。老师们除了教书育人这项主职之外,还有很多角色都跟妈妈的性质差不多,平时需要时刻关注孩子们的状态。孩子情绪不稳定的时候,要及时劝导化解;孩子不高兴的时候,要及时安慰;孩子做错事了,要及时纠正。尽管孩子们前行的脚步很慢,可老师不催不恼,不急不躁,用无限的慈爱和包容伴随着孩子们同行。

有时候,孩子会调皮的把小脸蛋凑到老师跟前,与老师的脸挨在一起,表达他们的信赖和欢喜。他们虽然不言不语,但是表达爱的方式,

没有因为身体自闭而阻碍。这是爱的回声,也是一个个稚童心底最清澈最纯真的爱,在闪耀!

还记得有个孩子刚来学校的时候还不会洗澡,与他相依为命的奶奶是靠捡垃圾维持生计的。因为洗澡少的原因,他全身黑黢黢的,散发着酸臭味,其他小伙伴都不愿跟他玩。孩子的班主任看着眼前这个与自己孩子差不多大的学生,心疼地带到宿舍去洗得干干净净的,并为他穿上自己孩子的衣服。在班主任的悉心照顾下,孩子像变了个人一样。虽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,但母爱不由自主地在全身蔓延、涌动。对于同事来说,照顾这个孩子虽是一名教师的本职,但更是一个母亲的本能。在每一位同事身上,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。

虽然不能像普校那样常为社会输送大批栋梁之材,但是,因为孩子的特殊性,特校的老师在学生身上付出了很多心血和精力,对学生的爱也不会比自家孩子少。他们默默在特教领域躬耕,不计较得失,不在意鲜花与掌声,只愿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,让学生收获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生存本领,为家庭减负。家长舒心的笑容,就是最好的嘉奖。

我的两位蒙师

■姜以钢

又到了九月开学季,不禁想起我的两位启蒙老师。

我出生在改革开放初的一个小山村。村里没有幼儿园,只得在小镇上的食品公司腾出一间瓦房,空出一角院落,凑来十多个孩子,就当做儿童的乐园了。在这儿,我遇到了第一个启蒙老师——刘老师。她二十出头,刚成家,扎着一根乌黑发亮的长辫子,一双眼睛亮而有神,话音甜美。高中毕业的,没读过正规师范类院校,但孩子们都喜欢她,喊她刘阿姨。

课上,没有正规教材和现成教具,刘阿姨就与孩子们一道动手自制,废旧报纸、罐头瓶、碎布片、烂绳头……经过她的指挥调度和大家的团结协作,戏法般变成了精美的小手工。枯燥的识字课和数字课,她也编成了一个个接龙和猜谜游戏。课后,小院的一捧细沙,几片瓦砾,数根枯枝,甚至洒满林荫小道的落叶,她都阵盘捡起,稍加改造后,就成为有温度的玩具,给孩子们带来了奇妙的乐趣。

要是遇上食品公司购猪时,院落的吆喝声、猪叫声,与窗内咿咿呀呀的童声和银铃般的笑语交织在一起,虽有些生硬,但也成为了深藏在我心扉的一朵回忆。

刘阿姨,既是我的启蒙恩师,又是我的邻居。那时,她家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。课后,孩子们常常去蹭电视节目。每次,她都带着我们搬椅子搬凳子,还摆上瓜子花生之类的小食品,让我们看得颇为尽兴。至今记得,《西游记》成了最受我们欢迎的节目。

我读小学后,她还一直关怀着我。记得我读三年级时,领回一个学校奖励的红塑料外壳的笔记本。她笑眯眯地摸了摸我的头,从怀里掏出一支钢笔,在笔记本扉页上写下几行字,字体娟秀柔美,如溪流清润,似蝶舞春风,其中“希望小以钢再接再厉、勇攀高峰……”这句话箴言般镌刻在我心底,多年来常常为我注入强大的能量。

进到村办小学,我幸会了第二个启蒙老师——李老师。她四十出头,从不轻易批评孩子,高大的身材与和蔼的神情形成了强烈反差。

我家离学校有三里山路,上学路上爬坡过坎,晴天一身灰,雨天一身泥。对于我这个不到六岁的孩子,也不算易事。要是赶上风雨霜雪天,迟到是难免的。记得有个隆冬的早晨,寒风如刀割、如针刺,不意外我又迟到了。教室里书声琅琅,我天性内向,不敢在教室外向老师喊

报告,只是紧紧倚靠着教室门,瑟瑟发抖。不一会儿,门开了,李老師悄悄来到我身边,摸着我的头,牵起我那冷得像胡萝卜似的小手,领到我的座位坐定,她才接着讲课。没有批评、没有埋怨,只有浅浅柔柔的笑。这笑,真甜!

冬天,教室的窗户没有玻璃,只有临时钉上的整块的透明薄膜。大部分孩子带了炕炉,说是炕炉,其实就一个破汤盆穿上铁丝,放几颗宝贝般的乌炭,便屁颠屁颠地提着上学了。记得有一次,我偷偷地把炕炉焐入棉袄取暖。正当我暗自得意时,教室里传出刺鼻的焦糊味儿。李老師很快晓得我的棉袄下角被烤焦了。她仍旧没有气恼,只是抿着嘴,轻轻地牵起我的手,到门外用雪团反复搓捏,才揉灭了藏在棉袄夹层中忽明忽暗的火星。她望着我,压低语音说:“小钢钢,以后要注意烤火的安全哟!”

课后,要是天气实在太冷,我们就不约而同地聚到教室角落或走廊边角,开玩“挤油”的游戏,人挨着人,用力挤动,身体很快就暖和了起来。李老師从我们身边经过时,别过头,转过眼,一笑而过。

多年后,很少再见到刘阿姨、李老師,但他们的亲切、和蔼,依然在我心田里生根发芽。

大山里的坚守

■丁芹

记得少时在老家上学,从家到学校要走十来里地。路旁除了稻田和坟莹堆砌的山峦,目之所及皆是荒无人烟,鲜有人家。有时因贪睡晚起,小伙伴们早已走得不见踪迹,长长的黄土路上,独有小小的我孤身前行,心中自是惊恐万分。山林间,杂草里,仿佛处处隐藏着野兽和鬼怪,我吓得不敢朝两旁看上一眼,只听得心儿怦怦乱跳,一路狂奔到一个叫做算盘石的小学校。

小学建在山丘上。大队(现在叫村)师资力量相当薄弱,任教的三名代课老师,仅有小学文化,比起其他农民来也许就多认得几个字,会算加减乘除而已。不过,也有一个例外,听说是家里成分不好,虽然考上了中专,但政审没通过,大人都喊他小马老师。小马老师一人教三个年级的语文、算术,每天从早忙到晚。

小马老师从不责骂迟到的我,也许是因为我作文写得好的缘故。我最喜欢上他的语文课,小马老师将我的作文每每当作范文朗读,看着同学们羡慕的眼神,我就像泡在蜜罐里一样,骄傲和幸福无以言表。自此,我爱上了语文,也从那时起,一颗文学的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。

记得2017年我再次回到山里。山上植被

茂盛,林木森森,翠竹环绕,野樱花在半山腰灿若云霞。远远地看见一座建筑,楼顶飘扬着国旗,青山环抱下显得格外显眼。走近一看,原来是我当年就读的小学校。

校舍里悄无声息,听不到孩子们的喧闹,院落里断砖碎瓦,如风烛残年的老人,被岁月逐渐风干瓦解。楼道进口的公示牌记载了学校由通城县机关干部职工捐款修建。

人呢?正当我为学校感到莫名的惋惜和伤感时,一阵清脆的铃声陡然响起,将我的思绪驱散。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冲出教室,在桂花树下尽情撒欢。教室里,一位身形清瘦的老人正在擦黑板,上面板书的是汉语拼音。听到声响,老人回过身看到我,推了推眼镜,以便将我这个不速之客看得更清楚。

啊?似曾相识的脸庞。难道是小马老师?!

随后的交谈基本是他在说,我在听。当年的小马老师如今的老马老师说,那年政策好了,他又参加了高考,幸运考上了师范,毕业时斟酌再三,仍放不下山里的孩子,又申请回来,从此扎下了根,在三尺讲台上年复一年,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孩子,直到后来撤校并村成了仅有十多名学生的教学点,马老师一直坚守在此。前几年退休后才随孩子住到了县城。

那您怎么又在教学?学生还只有两个。我很不解。

马老师看着两个孩子,说,以前山里很穷,现在国家政策好,很多村民都搬出了大山,仅有几户村民留守在此,孩子的教育就成了问题。村支书跟他聊到村里有个孩子至今没书读,他毫不犹豫又返回了大山里。最初只有一个学生,就是开头碰到的那个男孩。因为家庭变故,十岁多了还不识字。马老师没有放弃这个孩子,从零开始,一对一对他耐心施教。

马老师回村教学的消息也传到了另一户人家,小女孩的奶奶颤颤巍巍找了过来。女孩爸爸离世,母亲改嫁,因疏于管教,小孩子很野很顽劣,山外的老师管不了,奶奶也管不了,一听说马老师又执起教鞭,奶奶咋不喜出望外呢。

马老师对这仅有的两名学生很是疼爱,也很严厉,每天八节课一节不落。他亲自教语文和数学,音乐、绘画则通过互联网远程教学。他给每个孩子同样的关注和呵护。

又是几年过去了,马老师现在一切可安好?马老师用一辈子的坚持,印证了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那句名言,“学高为师,身正为范”。我为曾师从马老师而幸哉,也为马老师穷其一生奉献乡村教学事业而深感敬佩。

向阳而生
感恩有您

